

# 叶挺将军被软禁桂林

● 赵冬菊

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非法扣押后，于1941年至1945年间，被国民党长期囚禁达5年零2个月。1942年12月底，叶挺将军被解离重庆蒋家院子转押到湖北恩施，1943年8月，又被转到桂林。

在叶挺被软禁恩施期间，陈诚曾三番五次地亲自出马与叶挺接触。然而不但没有收到任何预期的效果，反而屡遭叶挺正义的斥责。陈诚的副官罗卓英、吴奇伟、郭忏等人的轮换游说，叶挺开始还寄希望于万一，希望他们能在释放新四军被俘将士等方面有所帮助。当叶挺了解到他们与陈诚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时，便报以对陈诚一样的态度，要么沉默应战，不予理睬；要么当面斥责国民党的失道行径，叶挺一次在盛怒之下，还打了郭忏一耳光。陈诚伎俩用尽仍无法降服叶挺，便到重庆去晋见蒋介石，建议将叶挺押往桂林。蒋介石害怕叶挺到桂林后会与曾经反对过他的李济深在一起，于己更为不利，便决定将叶挺转押到柳州，交给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长官张发奎看管。

叶挺在恩施已呆了好几个月，对国民党当局许下的诺言——“到恩施去好好休息”——已深有体会，既是长期软禁的无期徒刑，又是国民党各方面人物的轮换劝降。尤其陈诚的威逼利诱，更是不断花样翻新，就连叶挺想过“长期钻研”和苏武牧羊式的生活也不放过，于是，他想到了自杀、逃跑和到桂

林。而最终的理智选择是到桂林。因为这时叶挺的全家已先期到了桂林。

叶挺的老家本在广东惠阳县惠水楼村的叶家祠。八一南昌起义在流沙失败以后，叶挺成了蒋介石的“叛将”遭到通缉，全家人的安全都难以保障，只好携带全家逃至澳门隐蔽。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当时在广东主持工作的李立三对叶挺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及其起义的失败横加指责，还“给予他六个月留党察看的处分”（见《叶挺将军传》）。这一错误的决定虽然后来被党中央纠正过来，但“歧见仍在，且有人在继续向中共和莫斯科共产国际告状”（同上）。敌人方面，南京政府再次向叶挺下了通缉令，广东当局也在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加紧搜捕。叶挺不但人格、名誉受到玷污，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只好回到澳门的家中躲了一段时间。在意志消沉到极点时，他便离国而去，从澳门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后又到了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等地。其间，他偶尔也回来过。回来时仍以澳门作为生活起居之地。到了1932年，随着日本的入侵和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叶挺又抱着抗日救国的爱国激情，偕夫人和子女举家回到了澳门。以后，叶挺带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广泛的抗击日寇的战斗，却遭到国民党的暗算，成了阶下囚。而他在澳门的家也遭到了日军的占领，他们只好逃离该地。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把他的全家（包括他的岳母和

# 的前前后后

李秀文的姐姐姐夫及其5个孩子，连同叶挺自己的6个孩子等14人)接到了桂林。叶挺力争到桂林，也就出于与一家老小的团聚。同时，还可以与李济深取得联系，争取他的支持和帮助。

李济深既是叶挺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和广东粤军中的老袍泽，又是“四·一二”政变后的仇敌。面对蒋汪逆流，叶挺在南昌举起了反蒋义旗，李济深却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大屠杀，又在东江地区打散了叶挺、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他们之间，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从此，李济深当了蒋介石的助手，成为蒋介石手中的重要核心人物。但同时，他又与蒋介石有权力之争，如抵制蒋介石的削藩政策等，以后还公开反蒋，曾因此被蒋介石关押过。“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与蒋介石的争议更大，他坚持团结抗战，共赴国难，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而与蒋介石格格不入。但他又斗不过蒋介石，最后在蒋介石的咄咄进逼之下，他只好出走香港，然后准备联络两广地方势力反蒋抗日。叶挺回到澳门后，常去香港访亲问友，得知李济深也在这里，并了解到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因为对抗日和共产党的政策等方面有极不同的意见分歧而正在联络反蒋势力。于是，每当他去香港的时候，总要到李济深那里叙谈一番，特别是对李济深反蒋抗日的主张深表赞赏。这样，

他们的接触又多了起来。以后，他们还联合策划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叶挺等人又于1936年到广西苍梧李济深的老家，向他和住在他家的反蒋人士转达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样，在国难当头的逼人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们为了共同抗日的神圣事业重新建立了友谊。当叶挺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而被关在上饶李村和四川重庆时，梅文鼎还通过李济深的关系，找李济深给顾祝同和戴笠等人写了介绍信，使得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得以前往狱中探视。所以，看在那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的份上，叶挺也愿意到桂林。

当叶挺从恩施转到桂林的事确定下来以后，叶挺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其居地一带的土家农民朋友们告别。他逐户进行拜访，还叮嘱他们要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搞好生产，过好生活，看到美好的未来等。同时，叶挺又将他家里的部分家什用具送给了邻居们。地里种的庄稼、蔬菜，家里饲养的禽畜等分别送给了附近几家邻居。土家群众得知叶挺要离开恩施了，莫不伤感。他们都不愿叶挺离去，不少借过他钱和物的贫穷百姓都噙着泪水，东拼西凑地准备了钱来还他。叶挺不仅没有接收，反而对他们说：“你们有困难，就不必还了。”硬要他们拿回去。这些贫穷的百姓推脱不得，只好拿回了钱，有的感激得当场下跪致谢。叶挺想到马上就要与这些曾朝夕相处、有着深厚感情的土家百姓告别了，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感情，落下了热泪。

叶挺离别恩施的那一天，理顺了蓬乱的头发，换过了衣服，与前来送行的群众一一打过招呼后，便坐着一辆蒙着篷布的汽车踏上了新的征途。车于1943年8月的一天开到了桂林后，叶挺坚决不走，就在桂林住了下来。

叶挺到桂林后，在李济深关照下与先期来到这里的家人一起住进了一个旅馆。张发奎很快从柳州赶来，要叶挺去柳州，说重庆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宽待”叶挺，给了他“第四战区高参”的待遇，命令已提前下到了柳州。但叶挺留在桂林的决心已定，无论张发奎怎

## 【人物自述】

么劝,就是不去柳州。于是,又经李济深和张发奎商量,再报请重庆最高当局核准,将叶挺的这份待遇又从柳州转到了桂林。就这样,叶挺全家 17 口人就在桂林住了一段时间。

叶挺一家住在旅馆,生活极其艰苦,交足了房租,所剩无几,全赖李秀文的姐夫麦畅生到丽泽门外摆摊拍卖他们从澳门带来的李秀文姐妹俩的嫁妆首饰和衣物、器皿等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海内外不少人士得知叶挺一家的生活处境后,非常同情,纷纷从四面八方寄来了汇款,但都没能送到叶挺手里。同时,由于旅馆的租金昂贵,叶挺一家又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在七星岩建干路找到了一所平房,才减轻负担。此外,叶挺自己又再一次养猪养鸡,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叶挺到桂林后,国民党对他的监视似乎比在恩施时有所放松,特别是对他的行动并不加以干涉。叶挺就利用了这点自由去访问过一些朋友。可是,暗地里,特务们却处处跟踪、盯梢,仍然对他处处设防,封锁消息。只是由于叶挺的名望,还是有不少人很快知道“江南一叶”飘到了桂林。国民党老前辈何香凝女士还专程看望了叶挺一家,原新四军《抗敌报》编辑马宁还多次突破特务的防线来看望叶挺,还为他家的小孩治好了疥疮。叶挺还收到了陌生人送给他的《新华日报》,当地群众也自动组织起来为他捞猪草,喂猪。

几个月来,叶挺在桂林与多方面的接触,一直使蒋介石犯愁,尤其害怕他可能接触了共产党人及其组织。1943 年冬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意大利投降,德国法西斯濒临崩溃,日本在中国陷入了不拔之地。日本为了打通逃命的通路,又做出进攻湘桂的样子。这时,桂林地方又传言“绿林好汉要把叶挺劫往兴安山里”。蒋介石非常害怕叶挺在动乱中逃走。于是,传下密令:把叶挺再次解送回恩施。

蒋介石下达这个密令的时候,周恩来也听说了叶挺的“劫狱”之说,便向柳州地下党组织发了一个口头指示:蒋介石不敢公开杀害叶挺,叶挺不应跟人出走;如果出走,反而会给蒋介石以口实。柳州地下党组织与桂林

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桂林党组织决定由接到这个通知的胡希明在李济深的办公厅约见叶挺,把周恩来的指示当面转告给了叶挺。叶挺听到这个指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表示决不跟任何人出走。

叶挺在李济深的办公厅接到党的指示后,因家境困难,特别是因李秀文产后身体极为不佳,便准备筹措一些资金以应急需。但却未能如愿以偿,竟在一次意外中遭到了绑架。那是 1943 年 12 月 25 日,军统局桂林办事处在做好了了解送叶挺的准备后,对他下了手。

这天上午,住在叶挺隔壁的一个特务跑到叶挺家里对他说:“你们家有一只羊被后山的人偷走了。”叶挺立即披上外衣跟他上山了。到了山上,那个特务一下子不见了,却突然窜出了 20 几个挎着手枪的宪兵特务,将叶挺团团围住。一个领头的特务递上一封信说:“郭副长官(郭杆)请你到恩施去。”叶挺非常气愤,狠狠地打了那个特务一记耳光,并大声吼道:“请?为什么不到家里请?你们是土匪吗?三民主义是不是叫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那个领头的特务只好说:“我们不懂,你打我也没关系,我们这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说完,便将叶挺押进了一辆卡车,送到桂林城里的宪兵第五团司令部。在这里,叶挺给他家里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后,当天连夜被转押到了衡阳。次日,一个特务拿着叶挺给家人的信找到李秀文说:“叶高参(因为国民党对外宣传说叶挺在他们那里任高参之职)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李秀文问到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地少带些,下午 6 点钟再来接。”就这样,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三兄妹于当晚被特务带走了,27 日到达衡阳。叶挺父子四人在衡阳住了三天。随后,在宪兵特务的押送下到了宝庆,又住了一宿。当晚,宪兵特务害怕他们逃跑,看管非常严密。押解叶挺的营副还要正明陪着他睡,整夜都把灯光开着,另有拿枪的特务在房间里看守。经过 18 个日日夜夜,叶挺于 1944 年 1 月再次被押解到了恩施。